

唐宋之間蠶叢形象的轉變**

許 凱 翔*

摘 要

本文以在漢唐文獻中被視為古蜀君王的蠶叢為對象，梳理其形象在唐宋之間由蜀古王到蠶神的變遷過程。同時，將由宋代成都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之例，探討前述蠶叢形象轉折與唐宋蜀地社會變遷的關聯。本文論證蠶叢成為蜀地蠶神，是其形象在唐宋之間逐漸變化的結果。此一發現推翻一般認為蠶叢自古即為始蠶者、蠶市創始者與蠶神的說法。本為傳說中蜀古王之蠶叢，在唐末至前蜀杜光庭（850-933）的道教記傳中，被塑造為教民養蠶的始蠶者，蠶市之俗亦是模仿其行跡而成。後蜀北宋初期的蜀人接受此說，而將蠶叢與青衣神結合並立祠崇奉。所謂聖壽寺前蠶市，實際上是以聖壽寺前周邊的蠶叢祠前為地點，祈祭目的在於尋求蠶事順利。類似的發展，也可見於時代相近的蜀地其他神祇。這些神祇雖被溯源至唐甚至上古，實皆為因應唐宋之間商業化、城市化等社會變革影響而成的新興信仰。祂們之所以受到崇奉，多賴當時遠程貿易大盛，使民衆積極追逐絲織品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進而賦予其新的職能。由蠶叢信仰變遷的考察出發，將帶領我們認識唐宋蜀地商業發展如何帶動宗教變遷，進而造成當地祠神信仰在近世的轉型。

關鍵詞：蠶叢、蜀、蠶市、青衣神、聖壽寺

2019年10月22日收稿，2020年6月29日修訂完成，2021年1月20日通過刊登。

- * 作者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 本文以筆者博士論文第五章第一節為基礎修訂而成，先後報告於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第七屆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觀和國際酒店，2019年7月28日-30日）；日本宋代史研究會、福岡大學歷史學科合辦，「第71回東洋史學研究會日臺中國史研究者交流會」（福岡：福岡大學歷史學科，2019年8月25日）。（此次與會獲得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計畫編號：108-2914-I-001-035-A1）論文審查期間，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不吝指點。本文撰寫與修訂期間，幸得李貞德、陳熙遠、李卓穎三位老師，以及山根直生、山口智哉、曾美芳、童永昌、胡耀飛、谷口高至、王昊、黃文儀等師長學友給予珍貴意見與幫助，謹致謝忱。

一、前言

宋仁宗（1010-1063, 1022-1063 在位）時知益州田況（1005-1063）撰寫的〈（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詩，¹ 提到他初春參與益州城（即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以下統稱成都。）蠶市祭祀的見聞，其云：

龍斷爭趨利，仁園敞邃深，經年儲百貨，有意享千金。器用先農事，人聲混樂音。蠶叢故祠在，致祝順民心。²

從最後兩句，可知田況進行祭祀蠶叢以求養蠶順利的宗教活動，祭祀場所則為蠶叢祠。³ 此處的「蠶叢」，即是西漢至前蜀文獻中蜀國的開國君王。根據此詩描述，蠶叢在北宋已被民眾當作保佑蠶事順利的蠶神，在成都被立祠供奉。此涉及兩個現象，一是蜀地蠶市的興起，二為蠶叢形象之變化。本文的目的，即由蠶叢從蜀古王轉變蠶神的過程，重新討論唐宋之間蠶叢形象的變遷。

-
- 1 田況於慶曆八年（1048）四月至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知益州。參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11），頁 12。
 - 2 宋·田況、宋·袁說友等編輯，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9〈成都遊樂詩·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頁 179。
 - 3 宗教一詞，是十九世紀日本學者取自中國佛教文獻中指稱「宗派之教」的名詞，用以翻譯 religion，後傳入中國而為學界所習用。參陳熙遠，〈「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關鍵詞〉，《新史學》13.4(2002.12)：37-65。本文所謂宗教即源自前述脈絡，以指稱對人外力量等非經驗性因素的信仰。蒲慕州，〈中國古代的信仰與日常生活〉，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頁 14-15。田況祈求養蠶順利，體現中國宗教追求福祉的目標。關於此類宗教心態的討論，參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麥田出版，2004），頁 21。此外，楊慶堃（C. K. Yang）指出中國宗教分為具備獨立神學、神靈、儀式、神職人員組織的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以及雖具崇拜對象但較容易融入世俗觀念、結構或儀式的彌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參楊慶堃著，范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頁 228-229。彌漫性宗教在性質上接近祭祀供奉於祠廟之神祇的祠神信仰，蠶叢信仰亦可歸入此類。有關祠神信仰定義，參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2。

唐代後期的蜀地，出現以蠶市為名的特定商品集市。⁴在這類集市中，生產者、行商每年一至三月間於不同日期、地點聚集，供四方村民交易養蠶相關物資如蠶具、桑苗等，以便其應付春季蠶事展開之所需。同時，蠶市也兼營農具、果樹苗、藥材、車、日用品的買賣。⁵部分蠶市因與寺觀祠廟等宗教場所、宗教節日結合，而被認為是廟市（fair）的一種。⁶從田況詩中人聲鼎沸、鼓吹喧闐的形容，可以想像此蠶市在北宋中期交易時的熱鬧景象。對行商而言，面對這類一年只有幾次檔期的特定商品集市，特別是針對春季蠶事準備工作而聚集的蠶市，農蠶具需求的季節限制格外明顯。在此時期之內，民眾必須及時備妥養蠶所需的物資，否則可能無法順利展開蠶事。商人應早已發現到這類需求的迫切性，並視之為商機，因而長期囤積農蠶具及其認為有銷路的各類商品，爭相尋求在定期集市中壟斷交易，以期在蠶市一攫千金。⁷

-
- 4 鞠清遠，〈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食貨半月刊》3.6(1936.2): 28。前人對蠶市的討論，參許凱翔，〈八十年來唐宋史議題中關於特定商品集市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27（2013.12）: 107-136。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認為蠶市在唐代獨見於蜀地。參 Denis Twitchett, "The T'ang Market System," *Asia Major (New Series)* 12, no. 2 (1966): 240。宋代文獻中的蠶市，多指在蜀地者。北宋高承則引唐末至前蜀杜光庭（850-933）《仙傳拾遺》，將蜀地列為蠶市的起源地。見宋·高承撰，明·李訂，金圓、許沛藻校點，《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8〈舟車帷幄部第四十·蠶市〉，頁434。
- 5 此可參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新北：稻禾出版社，1997），頁377-378、264-267；加藤繁，〈唐宋時代的市〉，收入加藤繁著，吳傑譯，《中國經濟史考證》（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332-333。
- 6 相關討論參鞠清遠，〈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頁28；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377-378；Twitchett, "The T'ang Market System," 240-41。
- 7 宋代蠶市中蠶具價格之浮動，如北宋蘇軾（1037-1101）〈和子由蠶市〉詩云：「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瓢為輪土為釜，爭買不翅金與鈔。」見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4〈和子由蠶市〉，頁133。薦蠶的荻箔去年因霜害而不足，今年便有商人囤積。荻箔、繅絲的瓢輪與土釜因民眾急於用於蠶事而被搶購，價格甚至曾經高於金、絹。田況，〈（正月）五日州南門蠶市〉詩云：「齊民聚百貨，貿鬻貴及時，乘此耕桑前，以助農積資。物品何其夥，碎瑣皆不遺，編籥列箱筥，飭木柄磁錡，備用誠為急，舍器工曷施。」見宋·田況、宋·袁說友等編輯，趙曉蘭整理，《成都文

田況祭祀的蠶叢祠，與本文論題密切相關。本文想指出的是，蠶叢的形象，在唐宋之間經歷由古王逐漸演變為蠶神的過程，其蠶神地位並非自始即然。此一變遷的形成，與此時期蜀地絲織業的發展關係密切。透過釐清蠶叢的形象變遷，一方面可梳理蜀地蠶神信仰與蜀地產業發展的關係，同時也能探索近世蜀人如何理解甚至形塑古蜀的歷史。

上述討論涉及兩個問題：首先，蠶叢與蠶事之間的關聯為何？其次，蠶叢的蠶神形象究竟是在何時確立？對於第一個問題，此前研究大多根據蠶、叢二字形義，主張蠶叢其人或部族為蜀地養蠶的發明者。⁸有的以唐宋文獻中蠶叢教民養蠶傳說為基礎，主張蠶叢為蠶市的創始者。⁹另外，

類》，卷 9〈成都遊樂詩·五日州南門蠶市〉，頁 178。就中可見買賣雙方在春季農蠶事展前，對於換取資金與備齊工具的各自需求。更甚者，部分蠶市中交易的農蠶具數量龐大，「其值千緡至萬緡者」。見宋·陳元靚撰，許逸民點校，《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卷 1〈春·售農用〉引《四川記》，頁 50。

8 例如朱希祖主張蜀為蠶之古字，蠶叢為蜀地養蠶業之祖。參朱希祖，〈古蜀國為蠶國說〉，《新四川月刊》2(1939): 70-74。任乃強認為蠶叢氏源自蜀山氏。蜀字與性孤獨而不聚食之野蠶有關，蠶叢氏則在發明聚蠶飼育的家蠶養殖技術後別為一支，而得蠶叢之氏名。參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 50-51；〈蠶叢考〉，附錄於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96-99。古賀登由叢字主張蠶叢養家蠶，而據蠶叢墓的可能位置，說明今阿壩羌族自治區的茂縣為古代養蠶傳說流傳地之一。參古賀登，《四川與長江文明》（東京：東方書店，2003），頁 49-53。范勇推測蠶叢之名來自蜀山氏，蜀源自指稱野蠶的蠋，蜀山氏則指住在有野蠶之地的人。蠶叢氏與養蠶的關係，亦見於三星堆銅器的圖案。參范勇，〈蠶叢考〉，《中華文化論壇》2009.2(2009.11): 96-98、101。

9 游修齡認為蜀人以養蠶著稱，自然以蠶為地名、人名。蠶叢是教民蠶桑之人（神），但地位被嫫祖取代，成為只代表蜀地的蠶人（神）。參游修齡，〈蠶神——嫫祖或馬頭娘？〉，《古代文明》1(2002): 303-304。然而，他並未說明蜀人與養蠶的關係如何形成，對蠶叢相關記載的出處時序、文獻性質及內容皆未加分辨，反而模糊了蠶叢作為始蠶者與蠶神形象的差異。趙殿增曾引北宋馮鑑《續事始》為據，稱蠶叢曾教民養蠶。參趙殿增，《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頁 170。實際上，《續事始》該則註明是引自杜光庭的《仙傳拾遺》。劉瑞明羅列西漢以降蠶叢記載，在未加考證下逕稱蜀地文明始於絲綢。參劉瑞明，〈古代蜀地蠶桑經濟與蠶神話考辨〉，《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2(2012): 43。賈鶴雯則引

亦有兼持前述二說者。¹⁰ 然而，第一種說法引述的古代文獻中，實則未見蠶叢教民養蠶的記載，僅透過旁證或從蜀、蠶等字附會蠶叢與養蠶的關係。¹¹ 第二種說法逕以唐宋文獻中蠶叢的蠶神形象為據，提出蠶叢自古即為蠶神的論點。此說對蠶叢相關文獻來源、時序及其反映的時代特色皆未加分辨，反而混淆了蠶叢形象的變遷軌跡。雖然有學者曾就蠶叢創始蠶市之說提出質疑，但可惜未針對相關文獻進行細緻的分析。¹²

唐宋仙傳、筆記說明蠶叢為蜀人蠶神。參賈雯鶴，〈蠶叢考〉，《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1(2011.1): 96-97。劉術亦據《仙傳拾遺》，主張蠶叢所處時代已有蠶桑貿易的集市。參劉術，〈唐代成都蠶市略論〉，《古今農業》，2016.3(2016): 32。

- 10 袁珂以甲骨文中蜀字字形似蠶，推測古代蜀地養蠶業之發達。他又據五代宋初黃休復《茅亭客話·鸞龍骨》認定蠶叢曾教民養蠶，民眾則隨蠶叢四處遷移，所到之處便形成蠶市。參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232。馮廣宏考察蜀人器物圖騰，嘗試延續任乃強以蠶為蠶叢部族名的說法，並據唐宋文獻所見蠶叢發明養蠶與蠶市傳說，主張蠶叢氏在遷移至平原後逐漸發展蠶業與集市，成為後世蠶市的基礎。參馮廣宏，〈蠶叢新考〉，《文史雜誌》2007.6(2007): 4-9。
- 11 部分學者嘗試對蠶叢之義提出他解。例如孫次舟反駁朱希祖以蠶叢為蠶業之祖等論，認為蜀與蠶非指同一類蟲，且古蜀蠶業並不發達，宋代文獻更無法作為考察古蜀歷史的證據。參孫次舟，〈讀〈古蜀國為蠶國說〉的獻疑〉，《齊魯學報》1941.1(1941): 153-174。童恩正主張蠶、蜀本指性質相反的兩種蟲，前者為產絲的益蟲，後者是螫人的毒蟲，兩者不可混淆。蠶叢的名號，則源自岷山如簇蠶之山形。參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頁 55-56、59。劉道軍則提出蠶叢出自蟾蜍一說，參劉道軍，〈古蜀王蠶叢考辨——蠶叢實為蟾叢〉，《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2007): 49-54；〈古蜀人為何崇拜蟾蜍〉，《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8.2(2007.3): 107-108。蒙默以為蠶叢與冉駝在居住地、名稱音讀等有相通之處，且因蠶叢居於寒冷不宜養蠶的岷山，故與蠶事無涉。參蒙默，〈《蜀王本紀》「左言」、「左衽」辨釋及推論〉，《文史雜誌》2012.4(2012): 25。
- 12 鞠清遠指出《茅亭客話》〈鸞龍骨〉中以蠶叢為蠶市起源的說法不足信，可惜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參鞠清遠，〈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頁 28。劉復生主張北宋蜀地絲織業與盛帶動蠶市興起，使蠶與蠶叢產生關聯，導致蠶叢被塑造為蠶市開創者。參劉復生，〈「都廣之野」與古蜀文明——古蜀農耕文化與蠶叢記憶〉，《中華文化論壇》2009.11(2009): 59-62。然而，他並未留意蠶叢形象在唐末即已出現改變，從而將始蠶者、蠶市創始者、蠶神等形象混為一談。劉道軍亦認為蠶叢與蠶事的關係是後

至於第二個問題，部分有關中國蠶神信仰的討論雖也提及蠶叢，但對蠶叢在何時成為蠶神的說法有待商榷。¹³ 而且，前述兩種說法的共同問題，在於將始蠶者與蠶神混為一談，忽略了蠶叢在宋以前尚未作為神祇而受祭祀。要言之，此前研究對蠶叢與蠶事關係的論述，實則缺乏文獻根欲據。考察蠶叢與蠶事、蠶神信仰的關係，應從文獻中蠶叢形象的演變著並手，回歸對其歷代相關文獻的爬梳與比對。

在以下討論中，本文將先探討前述一月二十三日蠶叢祠蠶市的位置與成立，考證北宋蠶叢信仰與蠶市如何結合，從而形成一廟市。其次，關注在漢唐被視為古蜀君王的蠶叢，梳理其形象在唐宋之間轉變為蜀地蠶神的過程。復次，將由唐宋之間蜀地絲織業與蠶神信仰的發展，解釋蠶叢形象變遷的原因。

二、蠶叢祠前蠶市的位置與祭祀

據前引田況〈（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詩，是日蠶市在北宋中期多被稱為聖壽寺前蠶市，而非蠶叢祠前蠶市。但詩中民眾前來此蠶市的目的之一，即在向蠶叢祈求蠶事順利，是以蠶叢祠才是此蠶市活動的中心，此蠶市則是以祭祀蠶叢為旨聚集的廟市。蠶叢祠的位置，可能緊鄰聖壽寺前的空間。何以此蠶市的空間出現佛教、祠神信仰接近的情況？欲釐清此中原因，必須先確認此一集市空間的發展，故須由聖壽寺的成立與位置談起。

此蠶市所在的聖壽寺，在唐末以前原名空慧寺。其址傳說為李冰沉石犀之處，後來晉代王羽在此捨宅為寺，最初名為龍淵寺，位於成都城西南石牛門市橋附近，在隋代再被更名為空慧寺。成都另有一聖壽寺，為

世蜀地絲織業發展下追溯的產物，但未就此進行討論。參劉道軍，〈古蜀王蠶叢考辨〉，頁 49。

13 Dieter Kuhn 指出蠶叢祠發現於 483 至 493 年之間，蠶叢則在明清以青衣神之名著稱，並說明蠶叢教民養蠶事蹟。參 Dieter Kuhn, "Tracing A Chinese Legend: In Search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irst Sericulturalist,'" *T'oung Pao* LXX (1984): 234. 可是，Kuhn 所引研究與史料，並未對應其對蠶叢祠被發現時間的推測。

唐憲宗元和二年（807）朝廷在成都敕建，位於萬里橋南。會昌毀佛期間（842-846），空慧寺與聖壽寺皆被破壞。然則，唐宣宗大中元年（846）時，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回在空慧寺原址重建一寺，卻摹寫聖壽寺額立於此一新寺。唐僖宗（862-888, 873-888 在位）後更御書於此寺。所以，此後文獻所稱的聖壽寺，應是在空慧寺舊址重建者，而非元和時期的舊聖壽寺。¹⁴（見圖一）

至於蠶叢祠，於後蜀至北宋初生活於蜀地的黃休復，在其《益州名畫錄》〈能格上品十五人·蒲延昌〉中云：「兵火後餘聖壽寺、青衣神廟人物數堵，見存。」¹⁵蒲延昌活躍於後蜀孟昶（919-965, 934-965 在位）廣政中期後（951），由此可知最晚至後蜀後期，鄰近聖壽寺有一青衣神廟。關於此廟所祀之神，北宋樂史（930-1007）《太平寰宇記》云：「成都聖壽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蠶叢氏也。」¹⁶南宋祝穆《方輿勝覽》〈成都府路·成都府〉云：「蠶叢祠，蜀王蠶叢氏祠也，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寺。」¹⁷在宋代地理書中，皆記載聖壽寺中有一青衣神廟，並指出此青衣神即為蠶叢。從前引田況詩看來，作為地方首長的田況，則必須前往蠶叢祠致祭，以順應民眾對蠶事順利的期盼。從中可知前往此蠶市致祭者的目的地為蠶叢祠，而非聖壽寺。聖壽寺前僅是蠶市聚集的空間，與蠶市並無宗教意義上的關聯。聖壽寺與蠶叢祠之所以如此接近，或與晚唐五代不少寺院、祠

14 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收入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768-769。唐代官方認可的合法寺院，須為經官方賜額的額寺。參劉淑芬，〈唐、宋時期的功德寺——以懺悔儀式為中心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2(2011.6): 296-297。李回將

聖壽寺額立於原空慧寺，應代表官方正式以該寺為聖壽寺新址。

15 宋·黃休復撰，劉石校點，《益州名畫錄》（《五代史書彙編》丙編第 10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卷中〈能格上品十五人·蒲延昌〉，頁 6146。

16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卷 60〈方物記第二·蟲〉引《太平寰宇記》，頁 20。

17 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51〈成都府路·成都府〉，頁 913。

廟間存在依存關係，甚至共存一院的現象有關。¹⁸ 在此背景下，蠶叢祠緊鄰聖壽寺前空間而立，是可能存在的情況。¹⁹

元代費著撰《歲華紀麗譜》，追溯了一月二十三日蠶叢祠蠶市的緣起，其云：

（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為會，使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²⁰

此則將聖壽寺前蠶市的成立，歸之於北宋張詠（946-1015）的推動。張詠號乖崖，曾於宋太宗淳化五年九月至宋真宗咸平元年（994-998），與咸平六年四月至真宗景德三年十月（1003-1006）任益州知州。²¹ 張詠初知益州之前，蜀地經歷宋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993-995）的王小波、李順起事，使中央政府考慮到之前對蜀地過度壓制，改採相對溫和的治理方針。²² 在此背景下，張詠曾不顧屬下對於蜀地二月二日踏青節民眾聚集的治安顧慮，在是日率官員乘船遊江以與民同樂，而後在成都寶曆寺前創立一蠶市。²³ 此後，地方首長主動參與蠶市等歲時活動，便成為蜀地地方官的常例。²⁴

18 此可參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85-286。

19 蠶叢相關記載與佛教文獻中，不見對蠶叢與佛教關聯的敘述，因此蠶叢祠與聖壽寺應只是地點相鄰，未必有宗教上的聯繫。

20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明·楊慎編，劉琳、王曉波點校，《全蜀藝文志》（北京：線裝書局，2003），卷 58，頁 1710。

21 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頁 5-7。

22 Winston W. Lo, *Szechwan in Sung China: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aipei: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Press, 1982), 25.

23 宋·陳元靚撰，許逸民點校，《歲時廣記》，卷 1〈春·遊蜀江〉引《壺中贅錄》，頁 49。關於唐宋蜀地二月二日出外踏青之俗，另可參中村喬，《中國歲時史的研究》（京都：朋友書店，1993），頁 157-162；中村裕一，《中国古代の年中行事》第 1 冊（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 322-328。

24 魏華仙，〈宋代官府力量與成都節日市場〉，《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此則中，張詠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首先前往聖壽寺，在此寺舉行蠶市以供行商聚集，讓一般民眾前來交易。聖壽寺前蠶市聚集時，張詠先至寺中的都安王祠祭祀。近世以前文獻中，不見都安王之記載，不易確知都安王的身分。但若對照田況詩中太守在同一蠶市致祭蠶叢祠之例，都安王祠可能是蠶叢祠之別稱。²⁵ 張詠宴遊的地點中，萬里橋在成都城南，郫江、檢江合流處之西，而且跨越檢江，是秦代以降城南的主要橋樑與舟運要地。²⁶ 祥符寺是聖壽寺別院，後來獲准獨立成寺；信相院在成都城西北，在宋代為成都大型寺院之一。²⁷ 由此看來，宋代蜀地地方首長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活動範圍，是由成都城南至西南、西北移動。知府向聖壽寺周邊的蠶叢祠致祭，則是該日蠶市活動的開端。此蠶市既與向蠶叢祈蠶福的目的結合，對當時蜀地民眾而言是因宗教目的而聚集的廟市。²⁸ 就中，蠶叢祠成為了蠶市中宗教活動的重心，由地方官祭祀蠶

40.1(2013.1): 159-168。

- 25 謝元魯由李冰曾於都安縣治水，並建有都安堰，而聖壽寺內有李冰所立的石犀，推論都安王可能為李冰。但他也指出歷代文獻缺乏李冰受封都安王的記錄，故此論點仍存在疑問。見謝元魯校釋，《歲華紀麗譜》（《歲華紀麗譜等九種校釋》，成都：巴蜀書社，1988），「謝元魯注」，頁 121-122。對李冰傳說的考證，可參桑秀雲，〈李冰與二郎神〉，收入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創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 2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1978），頁 659-678。而且，李冰以治水聞名，其事蹟不見與養蠶之關聯。若在蠶市聚集日祭祀李冰，似乎於理不合。另外，儘管都安王在近世缺乏記載，但清聖祖康熙十二年（1673）蔡毓榮等纂《四川總志》則直指都安王即蠶叢。見陳孟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6，據民國二十年（1931）間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清聚珍影印），卷 588〈方輿彙編·職方典五·成都府部彙考四·成都府封建考〉引（康熙）《四川總志》，頁 728。此說明至清代初期蜀地，已出現這一說法。
- 26 任乃強，〈成都七橋考〉，附錄於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頁 224-225。
- 27 王衛明，《大聖慈寺畫史叢攷——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 21-22、29-30。
- 28 宗教場所周邊的集市，雖都可泛稱為廟市，但仍有具有宗教意義者與純商業活動者的區別。參朱越利，〈何謂廟會——《辭海》「廟會」條釋文辨證〉，收入朱越利，《道教考信集》（濟南：齊魯書社，2014），頁 281-306。

蠶祠作為是日節日活動的開端。

此外，前引《歲華紀麗譜》另云：

（一月）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為之，俗往往呼為蠶叢。太守即門外張宴。²⁹

此處的五門，是前蜀王建（847-918, 907-918 在位）拓展成都子城西南後在該處所建的門樓。³⁰（見圖二）對照時間與地點，此蠶市可能即與田況〈（一月）五日州南門蠶市〉詩中所述集市相符。³¹從《歲華紀麗譜》對一月五日蠶市的敘述，可見近世蜀地風俗中，該蠶市也被視為蠶叢的創制。當地民眾以紀念蠶叢創蠶市的名義，在五門附近聚集交易。這顯示蠶叢作為蠶神，在北宋成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三、始蠶者與蠶市創始者

若將田況在一月二十三日時前往蠶市，同時致祭於蠶叢祠等兩事並觀，則引發一個問題：蠶叢與養蠶有何關聯，使蜀地地方官須得順應民意，在是日前往祭祀？此問題涉及蠶叢其神的職掌，而可由該信仰的形成過程找尋線索。以下將爬梳蠶叢相關文獻進行分析，以釐清蠶叢與蠶市的關係。

蠶叢被與與養蠶、蠶市聯繫在一起的記載，最早見於唐末至前蜀杜光庭所撰的《仙傳拾遺》。該書〈蠶叢氏〉云：

蠶叢氏自立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千頭。每歲之首，出金頭蠶以給民一蠶，民所養之蠶必繁孳，罢即歸蠶於王。巡境內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因其遺事，每年春置蠶市也。³²

29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頁 1709。

30 許凱翔，〈宋代成都玉局觀藥市的宗教性〉，《臺大歷史學報》，64(2019.12): 91。

31 宋·田況，〈成都遊樂詩·五日州南門蠶市〉，頁 178。

32 唐·杜光庭，《仙傳拾遺》，（《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4〈蠶叢氏〉，頁 869。

此處的金蠶非指生物，應是以金屬塑造為蠶形狀的器物。³³ 晉代《三輔故事》記載秦始皇陵為項籍（羽）（232-202 BCE）所發，陪葬品中有「金蠶三十箔」。³⁴ 東晉陸翽《鄴中記》敘述西晉永嘉末（312）時，發掘齊桓公（?-643 BCE）墓，其中所得金銀珠寶中，亦見「金蠶數十箔」。³⁵ 南朝顧徵《廣州記》述吳黃武三年（224），遣交州治中呂瑜挖掘趙嬰齊墳墓，亦見大量金蠶。³⁶ 《南齊書》〈宜都王鏗傳〉另載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493）時，桓溫（312-373）女之墓被盜掘，墓中有「金蠶銀繭及瑇瑁」。³⁷ 《南史》〈始興簡王鑑傳〉述南齊蕭鑑（471-491）任益州刺史時，曾在州中某園地發現一古冢，僅餘石槨而無棺，墳裡寶物中有「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蕭鑑命何佇為該墓起墳，對寶物則一無所犯。³⁸ 綜合這些記載，由秦至六朝，金蠶多被當作陪葬的明器。

至於《仙傳拾遺》〈蠶叢氏〉中的金蠶，應是有咒術效果的器具，效果在於促進蠶的繁殖。此則中蠶叢政權的基礎，可能被認為來自金蠶的咒術性質，使其能夠成功在蜀地推廣蠶事，進而得到民眾的擁護。³⁹ 蠶叢巡行於其統治區域時，人民因得蠶叢所賜金蠶而使蠶事順利後，便將金蠶歸還蠶叢，同時在蠶叢停留之處聚集交易，而後形成集市。唐代末期蜀地春

33 今日所見幾件漢代至六朝金蠶，皆為銅質鍍金材質。參劉釗，〈說「金蠶」〉，《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3(2015): 141-142。其中，最早被發現的金蠶實物，為中國陝西省石泉縣發現的漢鎏金銅蠶。參李域錚，〈石泉縣首次發現漢鎏金蠶〉，《文博》1986.2(1986): 94-95；冀東山主編，梁彥民分卷主編，《神韻與輝煌——陝西歷史博物館國寶鑑賞·青銅器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214。

34 晉·佚名撰，張澍輯，陳曉捷注，《三輔故事》，收入《三輔決錄·三輔故事·三輔舊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75。

35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65〈張奐傳〉，注引《鄴中記》，頁2143。

36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卷825〈資產部五·蠶〉引《廣州記》，頁678。

37 蕭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35〈宜都王鏗傳〉，頁631。

38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43〈始興簡王鑑傳〉，頁1087。

39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增補版）》（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9），頁154-155。

季的蠶市，被認為是模仿蠶叢巡行領土時，每停一處而成市的故事。杜光庭的道教傳記中，對於唐末五代蜀地的社會背景、民族、風俗等常有相當寫實的描繪，也可以作為考察蜀地社會史的重要材料。⁴⁰ 此則的敘述，實際上可能是唐末五代蜀地形成蠶市定期巡行境內各處之俗，被蜀人附會為蠶叢之創造，而後為杜光庭所記錄。

所處時代稍晚於杜光庭的黃休復，在其筆記《茅亭客話》中，延續並深化對蠶叢創造蠶市及蠶市活動的描寫。該書〈鬻龍骨〉云：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為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⁴¹

此則對蜀人居處不定的描繪，與杜光庭所述相近。五代宋初的蜀人，透過耆老的口耳相傳，形成以蠶叢為蠶市創始者的認知。他們將蠶市巡行移動的特性，歸之於古代蜀地尚無都邑，統治者隨桑林所在移動，並聚集民眾，教其養蠶的典故。⁴²

出身於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的蘇轍（1039-1112），在其追憶家鄉風俗的〈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蠶市〉詩云：

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蠶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隨手敗，今冬衣著及春營。傾困計口賣餘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待箱篋供婦女，亦有鉏耨供男耕。空巷無人門容冶，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亂倡優聲。蠶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方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⁴³

40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道教視野中的社會史——杜光庭(850-933)論晚唐與五代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1)，頁 4、14-15。

41 宋·黃休復撰，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1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卷 9〈鬻龍骨〉，頁 67。此書成書時間參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頁 46-49。

42 任乃強，〈蠶叢考〉，頁 220。

43 宋·蘇轍，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此詩描繪眉州民眾為準備蠶事的展開，在蠶市賣掉自用以外的糧食，並以所得購入農蠶具，同時描述了當地民眾在蠶市期間縱情宴飲、音樂的狂歡景象。就中，蘇轍將北宋眉州蠶市相關行事視為蠶叢時期風俗的遺存，以強調這些風俗由來已久。可見在他的認識中，蠶市的起始與蠶叢有緊密的聯繫。

可是，早期有關蠶叢的記載中，蠶叢是以蜀地古王的身分出現，不見與養蠶相關的敘述。這些記載依敘事重心不同，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著重蜀地歷史的線性發展，最早見於西漢揚雄（53-18 BCE）的《蜀王本紀》。該篇雖已散佚，但可在後世文獻中見其片段。例如西晉左思（250-305）〈蜀都賦〉引《蜀王本紀》云：「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⁴⁴ 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蜀王本紀》云：「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⁴⁵ 唐代歐陽詢（557-641）《藝文類聚》〈州部·益州〉引《蜀（王）本紀》云：「蜀始王曰蠶叢，次曰伯雍，次曰魚鳧。」⁴⁶ 北宋李昉（925-996）編《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二·劍南道·益州〉引《蜀王本紀》則云：「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權、魚易、俾明。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⁴⁷ 同書〈妖異部四·變化下〉引《蜀王本紀》云：「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隨王化去。」⁴⁸ 這幾

卷1〈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蠶市〉，頁22。

44 晉·左思，〈蜀都賦〉引《蜀王本紀》，蕭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4，頁175。

45 蕭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蜀王本紀》，收入蕭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46，頁2062。

46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6〈州部·益州〉引《蜀（王）本紀》，頁115。

47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卷166〈州郡部十二·劍南道·益州〉引《蜀王本紀》，頁574。

48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卷888〈妖異部四·變化下〉引《蜀王本紀》，頁123。

則記載的蜀地君主名稱或人數雖有出入，但都將蠶叢以至開明視為前後相續，接連統治蜀地的領袖，形成一代代由單一君主統一治理的線性歷史。⁴⁹不過，從三萬四千歲、四千歲等敘述，可以推知這些對撰者應已是遙遠的傳說。記載中各王存在時間既長，彼此年代又相隔懸遠，說明這些王彼此間未必有相承的關係。⁵⁰

第一類的書寫，其影響可見於後世詩文。唐代李白（701-762）〈蜀道難〉詩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⁵¹唐代岑參（715-770）〈招北客文〉則云：「蜀之先曰蠶叢兮，縱其目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無紀綱。」⁵²可見在唐代前期的蜀地，仍接受揚雄、常璩筆下的蠶叢形象。

第二類記載見《史記》〈三代世表第一〉「正義」引《譜記》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侖，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崑等處。」⁵³西晉常璩（291-361）《華陽國志》〈蜀志〉追述蜀王世系源頭時，亦採昌意娶蜀山氏女，所生子封於蜀的版本。⁵⁴由華夏文獻到蜀人對在地歷史的記憶，可見蠶叢一支的遠祖，在歷史書寫中成為黃帝一族的支庶，從而使蜀

49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頁 95。

50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頁 58。

51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點校，《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 3〈蜀道難〉，頁 199。

52 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5〈招北客文〉，頁 450。

53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3〈三代世表第一〉，「正義」引《譜記》，頁 506。正義原文所引書名為《譜記普》，其中「普」疑為衍字。參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13〈三代世表第一〉，「考證」，頁 225。《世本》亦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相承云，黃帝後。」見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卷 7 下〈氏姓篇下〉，頁 333。

54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 3〈蜀志〉，頁 113。

被納入以黃帝為起點，至虞、夏、商、周的華夏線性歷史與政治秩序。⁵⁵

與此前記載不同的是，《華陽國志》〈蜀志〉對蠶叢的形貌有了較具體的形容，其云：「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⁵⁶縱目究竟是何模樣，僅憑此記載並不容易判斷。不過，1986年四川省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後，其祭祀坑中有許多青銅面具，有的面具的眼角內側下彎、外側上翹，有的兩眼瞳孔以圓柱體向外突出。⁵⁷有學者認為這些面具中眼睛突出者，（見圖三、圖四）近似於文獻所描述的蠶叢縱目，並主張這些銅像與蠶叢及其族人有關，⁵⁸有的直指這些凸目銅像是蜀人為祖先蠶叢塑造的形象。⁵⁹

對於這類討論，王明珂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蠶叢至開明的歷史為後世蜀人所熟知，何以三星堆文化的出土，令許多熟悉中國歷史者如此驚訝？其後，他提到以蠶叢諸王相續統一蜀地的史觀，與成都平原考古遺跡呈現的多元文化和時代斷裂等情況有所差異。三星堆文化的存在，顯然不為揚雄、常璩等蜀人所知悉。若三星堆文化如部分考古與歷史學者所

55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頁100。

56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頁118。

5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23-33、162-199。

58 例如范小平，〈廣漢三星堆青銅人像在美術史上的地位〉，《四川文物》1988.6（1988）：46；〈廣漢商代縱目青銅面像研究〉，《四川文物》1989.1（1989）：58-62；〈三星堆青銅人像群的社會內容和藝術形式初探——兼與中東地區上古雕塑藝術之比較〉，收入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110；彭元江，〈試析「蠶叢」名號意涵的多元性〉，《文史雜誌》2014.1（2014）：35。

59 此可參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收入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頁84-86；〈人神交往的途徑——三星堆文物研究〉，收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97-99；《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頁167-168。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243-245；王炎，〈三星堆文物中的蠶叢文化因素探析〉，《中華文化論壇》2009.2（2009）：104-111；鍾周銘，〈試論縱目青銅像的造型內涵〉，《文史雜誌》2013.5：8-10。

言，與蜀古王蠶叢有關。漢晉蜀人對三星堆文化記載的空白，或顯示他們對本地歷史的失憶。從漢晉蜀人對古蜀帝王的書寫，也反映他們對本地歷史的陌生。例如《蜀王本紀》中「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積三萬四千歲」等描繪，分別代表在漢代蜀人記憶中，古蜀人所被賦予的異質化、蠻荒化，與神異化等特質，使漢代蜀人與蠶叢的關係產生斷裂。也因為對蠶叢的失憶，常璩在《華陽國志》〈蜀志〉中，更進一步改造了蠶叢的歷史形象，使其由蜀地本身的起源傳說，攀附為華夏歷史的邊緣。⁶⁰

延續前述脈絡，則衍生另一疑問：若蠶叢真如諸多學者所言，自古即為始蠶者與蠶神，何以被學者視為蠶叢部族遺跡的三星堆文化，或是漢晉之間蜀人重整的記述，都無法發現蠶叢與養蠶有關的記載？對此本文認為，在唐代以前的記錄中，蠶叢未與養蠶有確切關聯，此前有關蠶叢為蜀地始蠶者的說法無法成立。事實上，蠶叢在文獻中的形象，真正從蜀古王轉變為始蠶者、蠶市創始者的時間，應在唐代後期至前蜀之間。⁶¹

60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頁 93-102。另可參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9): 596-598；〈「驚人考古發現」的歷史知識考古——兼論歷史敘事中的結構與符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4(2005.12): 588-599；《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5），頁 246-247。

61 蠶叢被附會為蠶市始創者，亦見於唐人對蜀漢諸葛亮（181-234）的記載。唐代陳谿述及唐昌縣建德草市中的蠶市時，為蜀地蠶市起源提供另一說法。其云：「昔武侯以蜀陞胞，故令鄰邑翊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俟之徵徭。又每及上春，以蠶（蠶）為名，因定日而有知所往。」見唐·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并天王院等記〉，宋·李昉等編，宋·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宋刊本及明隆慶元年（1567）（序）胡維新刊本影印），卷 808，頁 4270-4271。此中，諸葛亮被追溯為蠶市創始者，但其與養蠶的關係卻不見其他文獻記載。

四、蠶叢蠶神形象的成立

可以留意的是，對照前引《益州名畫錄》〈能格上品十五人·蒲延昌〉、《太平寰宇記》對此祠敘述，以蠶叢為青衣神應始於後蜀至北宋初期。若再參考前引田況〈（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詩，可知蠶叢與青衣神的形象混同後，至北宋中期進一步與蠶市結合，形成以祭祀蠶叢祠活動為中心的廟市。

另外，《太平寰宇記》該則的後半，引用蠶叢給民金蠶的故事，以說明青衣神的職掌與養蠶有關，而為保佑蠶事順利的蠶神。⁶²南宋羅莘（1153-1237）為其父羅泌（1131-1189）《路史》〈因提紀·蜀山氏〉作注，以及《方輿勝覽》〈成都府路·成都府〉中，亦記載蠶叢祠位置與蠶叢教民養蠶事蹟，內容與《太平寰宇記》所載差異不大。特別的是，羅莘、祝穆先後引用且改寫了《南史》〈始興簡王鑑傳〉中，蕭鑑挖古冢得金蠶又復冢的記載，且皆添加一段建祠於該墳的描述。兩則不同之處，在羅莘注提到何佇受蕭鑑之命立祠，且直指該祠所祀即成都青衣神。⁶³

作為蠶神，何以蠶叢在後蜀以降形成穿著青衣的形象？此與古代將青色被視為春季代表色的觀念有關。先秦至晉的文獻中，春季勸蠶事與宮廷祭先蠶時，都須穿著青衣。⁶⁴蠶事與青色的關聯，可能來自戰國以降五行與四時的結合。在以此為基礎的每月行事規範中，春蘊含了生的意涵，反映五行中的木，以東方為代表方位，青色為春的代表色。⁶⁵養蠶是春季重要農事之一，也因為如此，祭蠶神時也配合五行觀念穿著青衣。蠶叢作為代表蠶事的神祇，穿著青色服飾，或出自這類觀念。

青衣神信仰的興盛，有時也與宋代蜀地的春遊之風結合。北宋馮山

62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 60〈方物記第二·蟲〉引《太平寰宇記》，頁 20。

63 宋·羅泌撰，宋·羅莘注，《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3 冊），卷 4〈因提紀·蜀山氏〉，「羅莘注」，頁 22；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卷 53〈成都府路·成都府〉，頁 913。

64 岳珍，〈青衣神考〉，《文史雜誌》2003.2: 24。

65 此可參徐復觀，〈《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收入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第 2 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31-40。

〈和呂少蒙蠶市〉詩云：「何處青衣舊俗酣，峨眉東畔蜀江南。從來歲首爭為市，大半民間已不蠶。幾日笙歌常繼燭，晚春桃李仍為藍。嬉遊果獲神明助，太守雖貧亦薺甘。」同詩末又注云：「公庫迫而春蠶叢燕遊之費為多，故云。」⁶⁶ 可知青衣確指蠶叢。當地民眾在晚春於蠶市遊玩，同時應也祭祀蠶叢，在時間、活動內容方面與聖壽寺前蠶市相近。太守雖憂心府庫費用不足，但為順應民情，仍未反對這類宴遊活動。⁶⁷ 由此可見，以蠶叢為祭祀對象的蠶市，在成都以外的蜀地區域也一度盛行，而證明青衣神蠶叢信仰流行於宋代的蜀地。

眉州的青神縣，其地名在中古認為與青衣神有關。《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三·嘉州〉引用南朝《益州記》云：「（青衣）神號雷埵廟，班固以為離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蓋此神也。」⁶⁸ 唐代李吉甫（758-814）《元和郡縣圖志》〈劍南道中·眉州〉述及青神縣的青神祠，其云：「青神祠，即青衣神，在今嘉州界。」⁶⁹ 嘉州在西魏屬眉州，在後周則改為嘉州。⁷⁰ 這兩則提到祠廟位置相近，應是同一所青衣神祠。此神祇以青衣為名，在於其祠接近青衣江一帶，該區域過去為青衣羌的活動範圍，而青衣之稱或來自該族群穿著青衣的風俗。⁷¹ 至於《益州記》提到的離堆，應出

66 宋·馮山，《安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卷 11 〈和呂少蒙蠶市〉，頁 331。

67 蜀人在歲時娛樂方面花費不貲的形象，在唐宋時期聞名全國。參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頁 784-786。

68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74 〈劍南西道三·嘉州〉，頁 1510。此則的簡要版，另可見宋·李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卷 166 〈州郡部十二·劍南道·眉州〉引《益州記》，頁 581。有關《益州記》的撰述時間，參王文才、王炎編著，《蜀志類鈔》（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77、108。

69 唐·李吉甫撰，賀次軍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2 〈劍南道中·眉州〉，頁 809。

70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75 〈州郡五·古梁州上·嘉州〉，頁 4957。

71 徐中舒，〈《交州異域記》蜀王子安陽史跡箋證〉，收入徐中舒，《論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 155。

自《華陽國志》〈蜀志〉中李冰鑿離堆治水、與水神搏鬥之傳說。⁷² 而且，宋以前其他對青神縣的記載中，未見蠶叢事蹟。傳說中蠶叢居住地在岷山一帶，與蜀地西南的眉州有一定距離。⁷³ 因此，以上所述的青神縣青衣神，未必能夠視為蠶叢。不過，北宋歐陽忞《輿地廣記》〈成都府路上·眉州〉云：「昔蠶叢氏衣青衣，以勸農桑，縣蓋取此為名。」⁷⁴ 此則除與前引《太平寰宇記》同樣賦予蠶叢著青衣的形象，且另將青神縣之名攀附於蠶叢。此說明青神縣得名於蠶叢之說，是在宋代才出現。

在宋以後，蠶叢為青衣神，以及青神縣名出自蠶叢的兩種說法結合為一。例如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青衣神〉云：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罔不靈驗，俗槩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云。⁷⁵

前引《仙傳拾遺》〈蠶叢氏〉中蠶叢巡行教民養蠶的形象，加入北宋以蠶叢為青衣神的觀念，使蠶叢以服青衣的模樣出現，同時又融合青神縣名由來之說。（見圖五）至此，蠶叢作為蠶神傳說的近世版本已然成型。由青衣神廟遍於蜀地的敘述，可以想像蠶叢信仰在近世西南地區之興盛。⁷⁶

由西漢至唐代晚期，蠶叢的形象，從文人追述古蜀歷史中的君主，變成道教仙傳中蜀地養蠶的發明者，同時也被認為是蜀人蠶市風俗的源頭。

72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頁133。西漢班固（32-92 BCE）對李冰鑿離口治水的記載，見漢·班固等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29〈溝洫志第九〉，頁1677。但其中並未提及祠神。

73 任乃強，〈蠶叢考〉，頁221-222。

74 宋·歐陽忞撰，李勇先、王小紅校注，《輿地廣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卷29〈成都府路上·眉州〉，頁838。

75 明·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清宣統元年（1909）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本），卷7〈青衣神〉，頁316。

76 Kuhn, "Tracing A Chinese Legend," 234.

蠶叢被賦予的始蠶者角色，在五代至宋為蜀地社會接受，蜀人更進一步將蠶叢塑造為保佑蠶事順利的青衣神。成都西南聖壽寺附近的青衣神廟（蠶叢祠），即是此信仰在成都城內的供奉場所，至清代晚期才成為廢廟。⁷⁷ 青衣神的信仰，則在宋代以後流行於蜀地，成為蜀地代表性的蠶神之一。

然則，何以蠶叢至唐代晚期才被賦予始蠶者的地位，進而在後蜀至北宋成為青衣神？對此，可以從蜀地其他蠶神、蠶市兩方面的變遷找到些許線索。

唐代晚期蜀地西北部，有另一與道教有關的蠶神「馬頭娘」。馬頭娘傳說的原型，來自東晉干寶(?-336)《搜神記》的〈女化蠶〉。〈女化蠶〉敘述上古一女子因思念遠地的父親，以嫁予該馬為條件，要求家中一馬將父親帶回。馬完成約定，卻被毀約射殺而剝皮。該女在院中對馬皮嘲戲，最後被馬皮捲走，數日後被發現化為蠶。此故事應是干寶蒐羅江浙地區民間傳說而成，後多為類書所引，成為養蠶起源的說法之一。唐代後期道教文獻中，出現對〈女化蠶〉的改寫。杜光庭《仙傳拾遺》將此故事改為〈蠶女〉，後其《墉城集仙錄》再略加增訂，而為其後道教文獻所引用。故事重點由解釋蠶的起源，轉而說明蜀地蠶神馬頭娘的由來。此版本接受以帝嚳（高辛氏）為中原在蜀統治者的說法，並將故事地點繫於蜀地。其中，違約殺馬的責任轉移至父親，蠶女被馬皮捲走化為蠶後，因被太上老君稱許具有孝義，得授九宮仙嬪而成仙飛去。爾後，在蠶女家附近的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皆在今四川省德陽市）交界處，每年都有民眾自四方前來祈求蠶事順利。這幾縣的宮觀中，塑有披馬頭的馬頭娘像，使〈蠶女〉成為了蜀地蠶神馬頭娘的初始傳說，並將馬頭娘納入道教神祇的範疇。⁷⁸

77 清·李玉宣等修，清·袁興鑑等纂，莊劍校點，（同治）《重修成都縣志》（《成都舊志》第 11 冊，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卷 2〈輿地志第二·廢廟〉，頁 67。

78 此可參許凱翔，〈《搜神記·女化蠶》試析〉，《早期中國史研究》3.1(2011.6): 87-122。惟此文原以唐代「蠶女」故事出自《原化傳拾遺》，據李劍國考證該書為《仙傳拾遺》之訛誤，羅爭鳴輯錄《仙傳拾遺》時亦從李劍國之說，今據此說略作修正。參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39-1040。另見唐·杜光庭，《仙傳拾遺》，卷 3〈蠶女〉，頁 841-842。

及至北宋，蜀地另出現一位與道教有關的男性蠶神張百子。張百子在南朝至唐代的文獻中原稱張伯兒，且被描述為一在成都北郊石斛山（學射山，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北郊鳳凰山）飛昇成仙的仙人，其記載中未見與養蠶相關的事蹟。到了後蜀至宋代中期，張伯兒被改稱為張百子或張柏子，且被視為蠶神。成都士人、庶民以及鄰近區域的民眾，視三月三日為張百子昇仙之日，並於是日前往至真觀內的張百子祠祈求農、蠶事順利，同時向觀內道士領受可祈求蠶福的符籙。⁷⁹ 此仙人以蠶神形象受到祭祀，也是始於後蜀至北宋初，應略早或接近蠶叢被視作蠶神的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蠶叢成為始蠶者，與馬頭娘蠶神形象的確立，都源自杜光庭對蜀地社會變遷的觀察。此二者形象的變化，反映蜀地部分區域絲織業出現了新的發展。而且，他更以蠶市作為其靈驗故事的背景，並透過將蠶叢描寫為養蠶、蠶市創始者，以及將馬頭娘轉變為蜀地道教蠶神，使道教與蜀地絲織業的蓬勃發展結合，強化道教在蜀地的地緣基礎。⁸⁰ 其次，他也時常透過對蜀地鬼神、聖地、仙人、動物的描繪，塑造蜀地神聖領土的形象，以突顯前蜀立國於此地的正當性，進而凝聚當地人心。⁸¹ 綜合上述，可知杜光庭一方面記錄蜀地絲織業與信仰關係的變化，另一方面將這些新現象融入其對蜀地神聖性的構築。在蜀地形成地域性蠶神信仰的初步階段，杜光庭的書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若考慮到蠶叢、張百子的性別與兩者信仰的形成時間，則可發現這兩位蠶神是近世以前少見的男性蠶神。前述馬頭娘形象在道教文獻中的成形，約在唐代後期。在此之前，仍以《搜神記》〈女化蠶〉為文獻流傳的主流。換言之，在唐代晚期以前，蜀地西北尚未發展出馬頭娘的信仰。更特別的是，此前的蠶神，由秦漢時期無具體形象的先蠶，至漢代出現菀窳婦人、禹氏公主等女性，嫫祖（西陵氏）在北周成為先蠶後，確立以女性

79 許凱翔，〈唐宋蜀地廟市的宗教空間——以三月三月蠶市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0(2020.1): 43-46。

80 許凱翔，〈唐宋蜀地廟市的宗教空間〉，頁 48。

81 傅飛嵐，〈蜀——杜光庭《錄異記》裡的「聖地」〉，收入傅飛嵐、林富士主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 297-356。

為國家蠶神的角色；民間蠶神中，則以長江中下游的紫姑神為代表。除了北齊曾以黃帝為先蠶外，多數以女性擔任此一角色。⁸² 這或與中國古代以「男耕女織」為理想性別分工，要求女性以紡織為家庭經濟與國家賦稅擔負責任的觀念有關。⁸³ 受此觀念影響，蠶神大多被認為應是擔當家中紡織責任的女性。即使蜀地存在蠶叢等男性蠶神信仰，但只有馬頭娘被近世部分農書、類書列入蠶神體系，且與嫫祖以外其他女性蠶神皆被視為後世新增的祭祀對象。⁸⁴ 而且，宋代末期以前，鄉村紡織的技術知識、生產責任等仍由女性控管，多數紡織品是農家或地主莊園婦女織造的簡樸產品，使鄉村紡織成為女性主宰的領域。至於城市紡織作坊的織工，到南宋才以男性為主體。⁸⁵ 蠶叢與張百子先後在唐宋之間以男性身分而成為蠶神，對比前述女性蠶神隱含的性別分工意涵，與絲織業以女性為主的發展，則更顯獨特。對於此一現象，或可由蜀人對蠶神地緣性的關注尋求解釋。

82 Kuhn, "Tracing A Chinese Legend," 220-25; 新城理惠, 〈先蚕儀礼と中国の蚕神信仰〉, 《比較民俗研究》4(1991.9): 18-24。有關紫姑神的討論, 參林富士, 〈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 收入林富士, 《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2009), 頁 506-508。

83 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著, 江湄、鄭京力譯, 《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頁 144-159; 同氏著, 吳秀傑、白嵐玲譯, 《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6), 頁 109-142。另可參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 胡志宏譯, 《內闈——宋代的婚姻與婦女生活》(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4), 頁 116-17; 內田純子著, 施厚羽譯, 〈考古學所見先秦時代的建築結構〉, 收入小濱正子等編, 《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0), 頁 45-46、58-60。鄭娟芝, 「漢魏六朝的女性紡織——勞動營生與倫理意義」(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頁 58-88。

84 此可見元·王禎撰, 孫顯斌、攸興超點校, 《王禎農書》(長沙: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4, 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九年(1530)刻本影印), 〈農器圖譜集之十六·蠶繅門·蠶神〉, 頁 609-611。明代類書《三才圖會》〈蠶神〉中, 亦採類似說法。見明·王圻、明·王思義輯, 《三才圖會》(《續修四庫全書》第 1233 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刻本影印), 人物卷 10 〈蠶神〉, 頁 686-687。

85 白馥蘭著, 江湄、鄭京力譯, 《技術與性別》, 頁 157-164。

直至九世紀後半，蠶叢作為蜀地養蠶始祖以至於蠶神的形象尚未確立。將蠶市起源的說法溯及蠶叢，說服力並不足夠。在蠶市初興之時，人們尚未將蠶市起源與蠶叢聯繫在一起。從蜀地蠶神信仰在唐宋之間的逐漸興盛，與蠶市出現於唐代中葉等現象，以及前述蠶叢蠶神形象的建立過程，可以推測蜀地蠶神信仰的發展，不僅不應追溯至上古時期，反而應該被視作唐代後期新出的社會現象。

蠶市首次見於文獻之中，是在九世紀前期。唐順宗朝至憲宗朝（805-820）間，成都詩人眉娘的〈和卓英英錦城春望〉詩，以及唐代韋臯（745-805）〈蠶市記〉碑。⁸⁶ 唐代陳谿為吳行曾創立彭州唐昌縣建德草市一事作記的時間，則為唐僖宗咸通十五年（874）。⁸⁷ 由韋臯〈蠶市記〉碑目中所署官銜，該記可能是韋臯封南康郡王後所作，該蠶市出現時間約為唐德宗貞元十七至二十一年（801-805）。⁸⁸ 由此可見，蠶市的興起時間，應早於記載蠶叢為蠶市始祖的《仙傳拾遺》。換言之，蠶市形成之後，蠶叢的形象才逐漸由古蜀君王轉變為蜀地蠶神。

若將蠶叢信仰與前述馬頭娘信仰的興起時間並觀，可知唐代後期以降蜀人對祭祀蠶神的熱衷程度有所提高。此或與蜀地絲織業在該時期的興盛有關。當時蜀地絲織生產雖然經歷數次戰禍的嚴重破壞，但多能快速恢復生氣而位居全國前列。即使在僖宗避難蜀地時，成都府庫仍能以絲綢賞賜士卒而不致匱乏。⁸⁹ 唐代後期蠶市的出現，反映蜀地絲織業相關物資的供需量，已足夠支撐單一種類特定商品集市在春季的多次聚集。到了宋代，蜀地絲織業仍持續成長。⁹⁰ 同時，伴隨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絲織業往特定

86 眉娘此詩創作時間，應在唐代中期。此可參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頁 747-748。

另見唐·眉娘，〈和卓英英錦城春望〉，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863，頁 9756；宋·王象之，《蜀輿地碑記目》（《叢書集成新編》第 5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金華叢書本），〈成都府碑記〉，頁 416。

87 唐·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歌馬亭并天王院等記〉，頁 4270-4271。

88 鞠清遠，〈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頁 28。

89 盧華語，《唐代蠶桑絲綢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60。另可參盧華語，《唐代西南經濟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108-112。

90 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 67-84。

產地集中與特殊化的傾向增加，四川、河北與山東、江浙三區域絲織業呈現鼎足之勢。⁹¹ 蜀地包含絹製品在內的物資，形成獨立的流通圈，而與淮河為界的南貨、北貨流通圈並立。⁹² 由此可知唐宋蜀地絲織業的盛況。

鄉村婦女生產的織物除用以繳交賦稅，其中的紗線與絹也作為商品流通於市場。而在北宋初期以降的成都，絲織業更形成初步的勞動分工。當時成都國家紡織工場的原料，主要源於當地農民生產之生絲，而多非來自稅收。此甚至導致部分農民放棄紡織，進而專注於養蠶與繅絲，以供應生絲的市場需求。⁹³ 鄉村養蠶各環節所需物品，也隨鄉村自給生產與商業接觸的增加而商品化。⁹⁴ 在蜀地蠶市中，可見荻箔、瓢輪、土釜等蠶具、桑苗等物資因應蠶事的季節性需求，成為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⁹⁵

當養蠶取絲可以換取更多利潤，蠶事順利的重要性便逐漸增加，民眾祈求蠶福的需求也隨之上升。在此背景下，唐宋之間蜀地出現了新的蠶市創始者與蠶神。例如諸葛亮在唐末蜀地亦曾被視作首創蠶市者，馬頭娘則變成什邡、綿竹、德陽等地的蠶神。到了北宋初期，張百子更直接與蠶神職能產生連結，其昇仙地學射山至真觀成為成都北郊三月三日祈蠶福的地點。由此可見，在蜀地絲織品商品化的影響下，民眾對相關信仰產生更多需求，將祈求對象擴及蜀地的歷史人物與仙人，甚至將蜀地以外傳說轉化為當地蠶神的起源故事。蜀地民眾信仰蠶神時，或更著重蠶神與其祠廟所在地的地緣關係，而非其性別特質。循此脈絡，蠶叢之所以被視為成都的代表性蠶神，與其作為古蜀歷史敘述中最富盛名的君王，而與蜀地政治中心成都淵源深厚有關。

唐宋之間蠶叢先被視為蠶市創始者，後更成為蠶神。因此，宋代蜀人在參與一月二十三日蠶市時，當是前往蠶叢祠，在一年之初祈求蠶事順

91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 251-252。

92 同上註，頁 145。

93 白馥蘭著，江湄、鄭京力譯，《技術與性別》，頁 158-159。

94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 264-266。另可參梁庚堯，〈自古入近世——唐宋鄉村商業活動的擴大〉，收入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462-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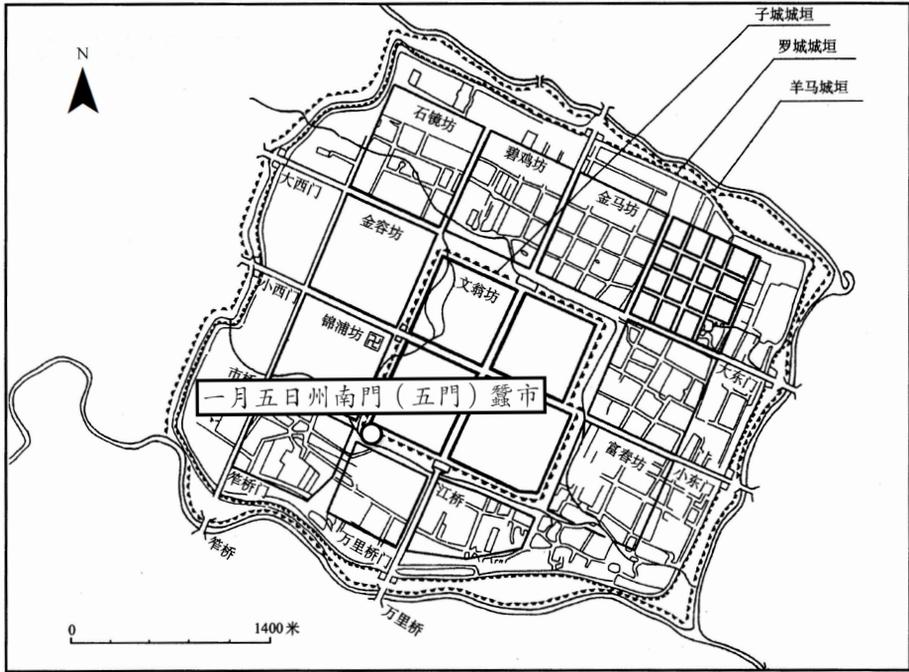
95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 264-265、377-378。

利，並在蠶市進行農蠶具和其他雜貨的交易。由此看來，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的蠶市，為一以祭祀蠶神活動為中心，聚集而成的特定商品集市，可說是以宗教目的出發的廟市，但此一宗教目的，卻也伴隨祈求蠶福的世俗性動機。張詠選擇在蠶叢祠創制蠶市，應是肯定蠶叢作為蜀地蠶神的代表性，而以象徵相關產業新風俗的蠶市與蠶叢祠結合。

五、結 論

本文從北宋成都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出發，探討唐宋之間蠶叢形象由蜀古王到蠶神之間的變遷。首要指出的是，本為古蜀傳說君王的蠶叢，在杜光庭的道教傳記中，才首次以教民養蠶的始蠶者形象被記載，蠶市之俗亦被附會為模仿蠶叢行跡而形成。杜光庭一方面詳實記錄唐末蜀人對蠶叢的新認識，另一方面將此形象下的蠶叢納入道教神仙之列，以強化道教與蜀地的聯繫。五代以降的蜀人接受此說，且進一步將蠶叢與青衣神的形象結合，並使蠶叢以蠶神的身分立祠祭祀。而且，蠶叢由蜀地始蠶者、蠶市創始者，轉變為蠶神的過程，實則晚於蠶市首次出現於文獻的時間。前述的發現，推翻一般認為蠶叢自古即為始蠶者、蠶市創始者甚至蠶神的說法，為蠶叢形象建構以至於古蜀歷史敘事提供新的觀點。

其次，此前有關近世蠶神信仰的研究，甚少從祠神與絲織業發展的關係展開討論。本文注意到蠶叢、馬頭娘、張百子等蜀地蠶神雖溯源甚早，實則皆為蠶市形成之後才有的信仰。這類崇拜的根本探求，是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這類神祇之所以會受到蜀地民眾的崇奉，在於唐宋之間商業化、城市化等社會變革影響而成的遠程貿易大盛，使民眾積極追逐絲織業帶來的豐厚利潤，從而強化對蠶福的渴求，並由地緣關係的脈絡將歷史人物、仙人等塑造為該地區之蠶神。蠶叢、馬頭娘、張百子等蠶神形象在近世的先後確立，以及稍早蜀地蠶市的發展，是當時蜀地社會變遷帶動信仰變遷下的產物。



圖二 成都一月五日州南門(五門)蠶市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此圖底圖修改自孫華，〈唐末五代的成都城〉，「唐末五代成都城復原略圖」，另標註一月五日州南門(五門)蠶市位置。



圖三 三星堆博物館藏三星堆 2 號祭祀坑出土銅面具-1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四 三星堆博物館藏三星堆 2 號祭祀坑出土銅面具-2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圖五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青衣神形象

資料來源：明·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7〈青衣神〉。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 漢·班固等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晉·佚名撰，張澍輯，陳曉捷注，《三輔故事》，收入《三輔決錄·三輔故事·三輔舊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蕭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蕭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點校，《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唐·李吉甫撰，賀次軍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杜光庭，《仙傳拾遺》，《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宋·文同著，胡問濤、羅琴校注，《文同全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9。
- 宋·王象之，《蜀輿地碑記目》，《叢書集成新編》第 5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金華叢書本。
- 宋·李昉等編，宋·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宋刊本及明隆慶元年（1567）（序）胡維新刊本影印。
- 宋·李昉編纂，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袁說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宋·高承撰，明·李果訂，金圓、許沛藻校點，《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宋·陳元靚撰，許逸民點校，《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
- 宋·馮山，《安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
- 宋·黃休復撰，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全宋筆記》第2編第1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宋·黃休復撰，劉石校點，《益州名畫錄》，《五代史書彙編》丙編第10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宋·歐陽忞撰，李勇先、王小紅校注，《輿地廣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 宋·羅泌撰，宋·羅莘注，《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
- 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王禎撰，孫顯斌、攸興超點校，《王禎農書》，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九年（1530）刻本影印。
- 元·陶宗儀纂，張宗祥校，《說郛》，臺北：新興書局，1979，據明鈔本。
-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明·楊慎編，劉琳、王曉波點校，《全蜀藝文志》，北京：線裝書局，2003，卷58。
- 明·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清宣統元年（1909）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本。
-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
- 清·李玉宣等修，清·袁興鑑等纂，莊劍校點，（同治）《重修成都縣志》，《成都舊志》第11-12冊，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

刊本。

清·陳孟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6，據民國二十年（1931）

間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清聚珍影印。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王文才、王炎編著，《蜀志類鈔》，成都：巴蜀書社，2010。

謝元魯校釋，《歲華紀麗譜》，謝元魯校釋，《歲華紀麗譜等九種校釋》，收入《巴蜀叢書》第 1 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

二、近人論著

中村喬 1993 《中國歲時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

中村裕一 2009 《中国古代の年中行事》第 1 冊，東京：汲古書院。

內田純子著，施厚羽譯，〈考古學所見先秦時代的建築結構〉，收入小濱正子等編，《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天野元之助 1979 《中國農業史研究（增補版）》，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王文才 1986 《成都城坊考》，成都：巴蜀書社。

王明珂 2002 〈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9): 583-624。

王明珂 2005 〈「驚人考古發現」的歷史知識考古——兼論歷史敘事中的結構與符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4(2005.12): 569-624。

王明珂 2006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王明珂 2015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王 炎 2009 〈三星堆文物中的蠶叢文化因素探析〉，《中華文化論壇》2009.2(2009): 104-111。

王衛明 2005 《大聖慈寺畫史叢攷——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古賀登 2003 《四川と長江文明》，東京：東方書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9 《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

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著，江湄、鄭京力譯 2006 《技術與性別——晚期帝

- 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皮慶生 2008 《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任乃強 1986 《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任乃強 2007a 〈成都七橋考〉，附錄於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24-227。
- 任乃強 2007b 〈蠶叢考〉，附錄於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19-221。
- 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胡志宏譯 2004 《內闈——宋代的婚姻與婦女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朱希祖 1939 〈古蜀國為蠶國說〉，《新四川月刊》2(1939): 70-74。
- 朱越利 2014 〈何謂廟會——《辭海》「廟會」條釋文辨證〉，收入朱越利，《道教考信集》，濟南：齊魯書社，頁 281-306。
- 李之亮 2011 《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
- 李域錚 1986 〈石泉縣首次發現漢鑿金蠶〉《文博》1986.2(1986): 94-95。
- 李劍國 1993 《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李劍國 1997 《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岳 珍 2003 〈青衣神考〉，《文史雜誌》2003.2(2003): 24-25。
- 林富士 2009 〈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收入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499-516。
- 范小平 1988 〈廣漢三星堆青銅人像在美術史上的地位〉，《四川文物》1988.6(1988): 45-47。
- 范小平 1989 〈廣漢商代縱目青銅面像研究〉，《四川文物》1989.1(1989): 58-62。
- 范小平 1993 〈三星堆青銅人像群的社會內容和藝術形式初探——兼與中東地區上古雕塑藝術之比較〉，收入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頁 107-115。
- 范 勇 2009 〈蠶叢考〉，《中華文化論壇》2009.2(2009.11): 96-103。
- 孫次舟 1941 〈讀〈古蜀國為蠶國說〉的獻疑〉，《齊魯學報》1(1941): 153-174。
- 孫 華 2000 《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

- 孫 華 2002 〈唐末五代的成都城〉，收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集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55-290。
- 徐中舒 1982 〈《交州異域記》蜀王子安陽史跡箋證〉，收入徐中舒，《論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150-165。
- 徐復觀 1975 〈《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收入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第 2 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1-83。
- 桑秀雲 1978 〈李冰與二郎神〉，收入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創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 2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659-678。
- 袁 珂 1960 《中國古代神話（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 梁庚堯 2013 〈自中古入近世——唐宋鄉村商業活動的擴大〉，收入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441-508。
- 許凱翔 2011 〈《搜神記·女化蠶》試析〉，《早期中國史研究》3.1(2011.6): 99-106。
- 許凱翔 2013 〈八十年來唐宋史議題中關於特定商品集市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27(2013.12): 107-136。
- 許凱翔 2020 〈唐宋蜀地廟市的宗教空間——以三月三日蠶市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0(2020.1): 29-59。
- 陳熙遠 2002 〈「宗教」——一個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關鍵詞〉，《新史學》13.4 (2002.12): 37-65。
- 彭元江 2014 〈試析「蠶叢」名號意涵的多元性〉，《文史雜誌》2014.1(2014): 34-36。
-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1999 〈蜀——杜光庭《錄異記》裡的「聖地」〉，收入傅飛嵐、林富士主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允晨文化公司，頁 297-356。
- 傅飛嵐 2001 《道教視野中的社會史——杜光庭（850-933）論晚唐與五代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 1997 《宋代商業史研究》，新北：稻禾出版社，1997。
- 游修齡 2002 〈蠶神——嫫祖或馬頭娘？〉，《古代文明》1(2002): 298-309。
- 童恩正 1979 《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馮廣宏 2007 〈蠶叢新考〉，《文史雜誌》2007.6(2007): 4-9。
- 新城理惠 1991 〈先蚕儀礼と中国蚕神の信仰〉，《比較民俗研究》4(1991.9): 7-27。
- 楊慶堃 (C. K. Yang) 著，范麗珠譯 2016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賈大泉 1985 《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賈雯鶴 2011 〈蠶叢考〉，《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1(2011.1): 95-111。
- 雷 聞 2009 《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
- 蒙 默 2012 〈《蜀王本紀》「左言」、「左衽」辨釋及推論〉，《文史雜誌》2012.4(2012): 24-28。
- 蒲慕州 2004 《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麥田出版。
- 蒲慕州 2010 〈中國古代的信仰與日常生活〉，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13-64。
- 趙殿增 1983 〈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收入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頁 81-92。
- 趙殿增 1996 〈人神交往的途徑——三星堆文物研究〉，收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91-103。
- 趙殿增 2004 《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南京：鳳凰出版社。
- 劉 釗 2015 〈說「金蠶」〉，《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3(2015): 141-142。
- 劉淑芬 2011 〈唐、宋時期的功德寺——以懺悔儀式為中心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2(2011.6): 261-323。
- 劉 術 2016 〈唐代成都蠶市略論〉，《古今農業》2016.3(2016): 31-38。
- 劉復生 2019 〈「都廣之野」與古蜀文明——古蜀農耕文化與蠶叢記憶〉，《中華文化論壇》2009.11(2009): 59-62。
- 劉瑞明 2012 〈古代蜀地蠶桑經濟與蠶神話考辨〉，《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2(2012): 43-47。
- 劉道軍 2007a 〈古蜀王蠶叢考辨——蠶叢實為蟾叢〉，《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2007): 49-54。
- 劉道軍 2007a 〈古蜀人為何崇拜蟾蜍〉，《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8.2(2007.3): 105-108。

- 鄭娟芝 2010 「漢魏六朝的女性紡織——勞動營生與倫理意義」，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冀東山主編，梁彥民分卷主編 2006 《神韻與輝煌——陝西歷史博物館國寶鑑賞·青銅器卷》，西安：三秦出版社。
- 盧華語 1995 《唐代蠶桑絲綢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盧華語 2010 《唐代西南經濟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鍾周銘 2013 〈試論縱目青銅像的造型內涵〉，《文史雜誌》2013.5(2013): 8-10。
- 鞠清遠 1936 〈唐宋時代四川的蠶市〉，《食貨半月刊》3.6(1936.2): 28-34。
- 魏華仙 2013 〈宋代官府力量與成都節日市場〉，《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0.1(2013.1): 159-168。
- 瀧川龜太郎 1972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
- 嚴耕望 2009 〈唐五代時期之成都〉，收入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717-792。
- 顧希佳 1991 《東南蠶桑文化》，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Kuhn, Dieter. "Tracing A Chinese Legend: In Search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irst Sericulturalist'," *T'oung Pao* LXX (1984): 213-45.
- Lo, Winston W. *Szechwan in Sung China: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aipei: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Press, 1982.
- Twitchett, Denis. "The T'ang Market System." *Asia Major (New Series)* 12, no. 2 (1966): 202-48.

三、網路資源

- 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網址：<http://dh.ascdc.sinica.edu.tw>.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n Cong during the Tang-Song Period

Hsu Kai-hsiang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when Can Cong 蠶叢 began to be worshiped as the deity of sericulture in Sichuan and how Can Cong became deified from being an ancient king of Shu 蜀.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a silkworm fair 蠶市 held near Sheng Shou Temple 聖壽寺 in Chengdu 成都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 have discovered that Can Cong was initially regarded as the first sericulturalist within Taoist hagiographi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refutes the notion that Can Cong has always been viewed as the first from ancient times. As the belief became accepted, the ruler of Shu, namely Can Cong, was thus popularly known as “qing yi shen” 青衣神 (god of blue cloth or the azure-robed spirit), a god of sericulture in Sichua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ith the processes of deification revolving around the above time frame in mind, I argu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legendary local figure was a result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ilk products, urbanization, and other social chang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Tang-Song period.

Keywords: Can Cong 蠶叢, Shu 蜀, silkworm fair, “qing yi shen” 青衣神, god of bluecloth, azure-robed spirit, Sheng Shou Temple 聖壽寺

* Hsu Kai-hs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